



莲池书院位于河北保定的古城中心，坐落在著名的北方园林古莲花池中，书院因其所在而得名。园林初名雪香园，为金元之际名将张柔所建，后赠予部将作私人园林，当时大儒郝经记载此处景致“茂树葱郁”“鱼泳而鸟翔”“虽城市嚣嚣而得三湘七泽之乐，可谓胜地矣”，明代称之为“古莲花池”，莲池因荷得名，以水为胜，但为之注入更丰富人文内涵的却是清代创办的莲池书院。1918年，毛泽东为安排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事宜第一次来到保定游览了古莲花池。1952年，他南下考察途中，重游莲池书院时说：“莲池之所以有名，关键是莲池书院有名，莲池书院在清末可称为全国书院之冠。”一语道出了莲池书院的知名度和在中国书院史上的重要地位。

备受重视的官办学府

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直隶总督李卫奉旨创建了莲池书院，院舍主体在莲池西北部，建有讲堂、圣殿、魁阁、斋舍等建筑，“厅事五间，精舍三间，廊庑共十一间，群房共四十余间”，另辟“南园”于东南部，为诸生自修、研习之所。整个书院山环水绕、亭台楼阁参差错落，优雅别致，是读书问学的好地方，成为清代直隶最高学府。莲池书院在办学的170年岁月里，汇集了众多名师大家、培育了大量英贤俊才，堪称清代官办书院的典范，对促进直隶乃至全国的学术传播和文教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自创立以来，莲池书院受到历代皇帝高度重视，特别是乾隆帝多次来书院巡视，赐御书“绪式濂溪”匾，希望师生效法北宋理学家、《爱莲说》作者周敦颐。在巡幸过程中，乾隆帝还给予师生不少赏赐，并赋诗多首，勉励师生一心向学，其一曰：“西巡回驻郡城边，便幸莲池爱爱莲。不必有花识君子，所欣此地育英贤”，表达了对莲池书院培养英才的深切期望。乾隆帝高度重视书院师资的选拔，在《训飭直省书院师生》的上谕中说，“居讲席者，固宜老成宿望”“凡书院之长，必选经明行修、足为乡士模范者”，为书院聘请师资制定了标准，认为院长要由知识渊博、品行端正和威望崇高的学者来担任。

清代历任直隶总督对莲池书院也格外关心和支持。嘉庆、道光年间三任直隶总督那彦成将家藏的包括唐褚遂良的《千字文》、颜真卿的《千福碑》、怀素的《自叙帖》、宋米芾的



□ 吴耀明

莲池书院：被毛泽东称为清末全国书院之冠

《虹县诗》、明董其昌的《云隐山房题记》等珍贵的名贤墨迹和旧拓拿出来，摹刻上石，嵌在了莲池书院南楼壁间，世称《莲池书院法帖》。这些法帖集中了历代书法大家的精品，供书院学生观摩，成就了一段艺林翰墨佳话。曾国藩督直期间，秉持湘学精神，倡导桐城派文风，极大地影响了直隶士风。“曾门四弟子”中造诣最高的张裕钊和吴汝纶两人接续主持莲池书院，将桐城派在北方发展壮大，为振兴直隶文教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人评价“张、吴两先生主讲保定之莲池书院，先后十余载，北方学者多出其门。此两先生者，皆尝亲承绪论于曾氏，于是燕蓟之间始有桐城之学”。

闻名天下的硕儒名师

莲池书院成立以来“延名宿，集诸生，肄习书院，劝学兴德”，可谓名师云集、硕儒荟萃，汪师韩、章学诚、祁韵士、黄彭年、何秋涛、李嘉瑞、王振纲、张裕钊、吴汝纶等在清代学术史、思想史上产生很大影响的名儒硕学先后出任院长，塑造了“经世致用、入古出新、南北合流、中西交融”的莲池精神。特别是光绪年间黄彭年、张裕钊、吴汝纶三位名家先后掌学，莲池书院的盛名不仅海内共知，还远播海外，名扬天下。

黄彭年，字子寿，号陶楼，贵州贵筑（今贵阳）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为人廉明刚毅，博学多通，长于史学及方志、地理之学。黄彭年于咸丰和光绪年间前后两次出任莲池书院院长，《清史稿》称其“主讲莲池及在吴时设学古堂，成就尤众”，主要成就有：一是扩建书院，增修讲舍二十四间；二是奏请将万卷楼划归书院，购置书籍二万卷，使藏书共达三万余卷；三是创办“学古堂”，



订立学规九条，光绪年间《保定府志》载，“学古堂在书院东，光绪八年总督李鸿章、院长黄彭年因莲花池万卷楼置，广储书籍，明立章程，为诸生肄业古学之所”，在教学上，不拘泥于科举应试课程，创设古课，开展朴学研究，扩大学术视野、规范读书方法；四是改革教学方法，提出“化乡酬世”的教育理念，使书院朝着经世致用的方向发展，黄彭年在《莲池书院记》中提出：“穷则以孝悌忠信化其乡，达则以经济文章酬乎世”，表达了不拘俗世的教育理念，即读书目的不应是“博科第”“登显要”，而要承担社会责任，当济世之才，倡导诸生学习知识要广博，对各地风俗、中外形势应多加了解。

张裕钊，字廉卿，号谦亭，湖北武昌人，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举

人，专事训诂，精通经史，古文造诣极深，并以书法著称于世，自言“于人世都无所嗜好，独自幼酷喜文事”。光绪九年（1883年）起，张裕钊任莲池书院院长，他认为兴学育才才是治国、强国根本，“天下之治在人才，而人才必出于学”；主张学以致用，崇尚通经致用、明体达用之学，反对“学为科举之文而已”；注重拓宽学生知识面，接触西学，经常以“策问”的形式要求学生回答关于新学的问題；还首开接待外国访问学者，招收外国留学生的先例。1884年，日本学者冈千仞前来访学；1887年，日本人宫岛大八因仰慕张裕钊的才学，坚持来保定拜师，留学于莲池书院。他跟随老师七载，持弟子礼甚恭，照料出力尤多，直至张先生故去方才回国，后创办善邻书院，为张氏书法和中华文化

在日本传播作出了贡献。1986年，“张裕钊 宫岛大八师生纪念碑”在莲池书院旧址落成，两国人民永久纪念这段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

吴汝纶，字挚甫，安徽桐城人，同治四年（1865年）进士，其古文功底深厚，乃桐城派最后的大师，有“海内大师”和“古文宗匠”之誉。他以科举正途跻身官场，其学识文章深得曾国藩、李鸿章赏识器重，先后入曾、李幕府。光绪十五年（1889年）起，吴汝纶主持莲池书院达13年之久，是目前已知莲池书院院长中任职最长的。在任期间，他推动书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一是为学强调以“经世致用”为宗旨，读经治史，兼采中外，以文章为一切学问根基；二是教学上重视新学，提倡西学，主张废除科举，向西方学习变法自强；三是聘请英国、日本教师，创设西文学堂和东文学堂，鼓励书院学生出国留学，认为只有“精通外语，熟习各国政治，始能宏济时变，以御外辱”；四是增加经费投入，保证学生质量的前提下，放宽招生条件，强化奖励机制，在考试制度方面，将开卷改为闭卷，对考试优秀者给予奖励。

1942年，一位署名“葭翁”的莲池弟子访书院故址后，写下了如下诗句：“莲池学派盛同光，第一师承贵筑黄（子寿先生首主莲池书院）。后有桐城传嫡乳（吴挚甫先生最后长书院），中流砥柱武昌张（张廉卿先生继黄而先吴）。”回顾了黄、张、吴三人主持书院的盛名与辉煌，反映了三位大家对书院乃至学界发展的贡献之巨大、影响之深远早已为世所公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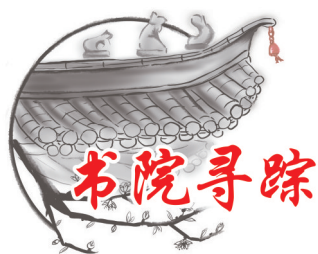
代不乏人的高徒才俊

常言道“好笋出好竹，名师出高徒”，正因莲池书院有硕儒大师掌院主讲，又有饱学名师谆谆教导，塑造了

兼通新旧、融合中西的文风，讲求实学、时务与古文辞并重的学风，才得以培养了一批批经世致用的人才，如：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状元、官至湖广总督的大学问家毕沅，中国历史上的末科状元、“第一人中最后一人”刘春霖，其他卓有成就的还有尹嘉铨、王发桂、苏维垣、胡景桂、王树枏、贺涛、刘若曾、贾恩绂、张以南、孟庆荣、尚秉和、李刚己、高步瀛、谷钟秀、邢赞亭等。这些莲池弟子或为学，或从政，也有的投身实业，真可谓“以勋光文曜，彪炳于仕途、议院、学校者，不可屈指数”。

1895年，刘春霖兄长、光绪二十九年进士刘春堂在《莲池书院铭碑》写道：“莲池书院者，北学盛衰一大关会也……数年以来，北地土风蒸蒸日上，三辅英杰多出其中”；1929年，吴汝纶之子吴闿生这样记述莲池书院的盛况：“才俊之士奋起云兴，标英声而腾茂实者，先后相望不绝也……畿辅人才之盛，甲于天下，取巍科登显仕，大率莲池高第，江浙川粤各省望风敛避，莫敢抗衡，其声势可谓盛哉”。这说明，清末民初，莲池书院不但成为文化学术的重镇，而且更是北方人才之渊薮。这里名师云集、人才济济，并造就了科甲鼎盛、精英荟萃。名师高徒的教学相长、不断磨砺也实现了相互成全、彼此成就，名师辈出、名徒不断才使莲池书院声振全国、名扬中外，至今为人津津乐道。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颁布改书院为学堂上谕，两年后莲池书院正式停办，改为校士馆，后又改为文学馆；1912年，改建为省立第二师范附属小学；1936年，宋哲元等在书院旧址发起成立莲池讲学院，次年日本发动七七事变，讲学院被迫停办。近年来，河北学界乃至社会各界一直努力复兴莲池书院，2022年7月终于翻开了新的一页，保定市与河北大学签约共建莲池书院，双方将深入挖掘“莲池书院”历史背景和文化底蕴，重塑“莲池书院”文化品牌，打造特色鲜明的书院复兴典范和传统文化创新标志，使这座有着近300年历史的冀门学府重现生机与活力。



书院寻踪

推动第一生产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

□ 韩杰才



大学书记校长论坛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这一系列重要论断告诉我们，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能否如期实现，高质量发展能否蹄疾步稳，关键要看科技自立自强。我们要深刻把握科技创新发展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聚焦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抢占科技创新战略高地，厚植科技创新整体效能，推动科技第一生产力更加高效自主地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成果，不断提升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底气、能力和水平。

掌握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主动权

把准并掌握科技创新领域基础性、引领性、颠覆性的共性关键技术，其根本要靠强化基础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人类社会自进入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就以一种不可逆转的力量推动时代发展滚滚向前，世界科技强国伴随历次科技革命浪潮先后崛起的历史充分说明：谁能掌握所在时代背景下推动科技产业革命的共性关键技术，谁就站在了科技创新的制高点，谁就掌握了发展动能转化升级的战略主动权。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的突飞猛进，学科交叉融合不断发展，科学研究范式发生深刻变革，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融合，基础研究转化周期明显缩短，国际科技竞争向基础前沿转移。作为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基础研究的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历史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唯有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重大机遇，科学化、组织化推进基础研究工作，从源头和底层解决原创性、颠覆性的共性关键技术问题，抢占基础研究战略高地，迎头赶上、并跑领跑，才能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走出一条自立自强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为世界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变革提供根本支撑。

要通过有组织的方式建立起基础研究的整体体系、重要平台和推动机制，引导和支撑科技工作者群体在具体科研实践中，既能够按照科学规律突破现有思维框架、另辟蹊径提出前沿问题，也要善于提出重大工程实践难题、因地制宜凝练科学命题，做到应用牵引和自由探索“两条腿走路”，不断推动基础研究向真问题聚焦发力，以真问题引领基础研究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布局。另一方面要强化合力攻坚。基础研究开展路径的系统性、复杂性，决定了基础研究要实现原创性、颠覆式创新，就必须要靠体系化的力量集群。我们要围绕有组织推进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需求，发挥好国家实验室引领作用、国家科研机构建制化组织作用、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主力军作用和科技领军企业“出题人”“答题人”“阅卷人”作用，突出各类力量的独特优势和协同效能，构建起与真问题结

构特质相匹配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筑牢高质量发展的科技创新阵地

要构建以科技创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体系，即推动科技创新与生产实际深度融合、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作出了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专章部署，并且紧跟在第四项战略部署“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之后，内涵深刻、用意深远，更加深刻表明以教育为基础、人才为根本推动的科技创新，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我们必须具体的社会生产实际中统筹好教育、科技、人才工作，着力构建以科技创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生态体系。

纵观五次世界科技中心转移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世界科技强国新次崛起的背后，教育、科技、人才是如何发生作用、产生联动并最终转化为科技第一生产力的。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世界科技中心在18、19世纪转移至法国时，法国通过启蒙运动营造了向往科学的社会氛围，涌现了一大批卓越科学家，在分析力学、热力学、化学等学科领域作出重大建树，但此时法国的研究工作以学院式为主，严重割裂了人才链、创新链和产业链，没有将科学有效转化为生产力，影响了法国的经济社会发展。

在“一点、一链、一体”上聚焦发力。“一点”就是要奔着最紧急、最紧迫的问题去，对我国科技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的基本判断保持高度战略清醒，瞄准关键基础材

料、核心基础元器件、精加工生产制造及检测设备、高端通用芯片等领域的卡点、堵点，集中力量破解“卡脖子”问题，在国际科技博弈中立根破岩、站稳脚跟。“一链”就是把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部署的战略意图，进一步强化统筹布局 and 精准施策，推动创新链、人才链、产业链深度融合贯通、协同发力，打通基础研究通向科技成果转化的“快车道”。“一体”就是要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建立起自己的发展模式和评价体系，勇于提出新的概念、理论、方法，开辟新的领域和方向，形成新的前沿学派，以科技创新自主体系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

以高效组织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面向大科学时代，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以强大的组织力、动员力和整合力来推动落实。世界各国在组织实施科技创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各有乾坤，但相较而言，我们有着独特而明显的领导优势、制度优势和作风优势，需要我们始终保持强大定力，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坚决的自我斗争精神，确保这一复杂系统工程科学运转。

党对科技事业的全面领导是根本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工作，将创新摆在我国现代化建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党中央始终在

科技事业发展全局中把舵定向，在每个关键节点都作出重大战略部署、制定方针政策，构建了高效的组织动员体系和统筹协调的科技资源配置模式。

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是制度优势。新型举国体制是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科技创新领域的集中体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通过科技领域实施举国体制，谋划打造了一大批事关长远、事关全局的国之重器。党的十八大以来，“新型举国体制”已然成为我国科技发展的独特优势，推动科技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党的二十大会更是明确提出要“健全新型举国体制”，为下一步高效整合各方力量，推动构建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导向下的政府、市场、社会力量有机创新体提供了行动指南。

大兴调查研究是作风保障。当前，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的战略阶段、新的战略要求、新的战略环境，科技创新中各种风险挑战、困难问题比以往更加严峻复杂，迫切需要通过调查研究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找到破解难题的办法和路径。我们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从科学问题凝练、科研力量组织、科研平台打造、科研项目攻关、科技成果转化等全链条深入开展调查研究，通过高水平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找准真问题、解决真问题，持续优化体制机制、资源配置，推动科技创新体系快速迭代、提档升级，使科技创新体系始终同高质量发展预期同步匹配，确保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注入强大动能。

（作者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